

一苇集

杭之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海 外 学 人 丛 书

一 苇 集

杭 之 著

海外学人丛书

责任编辑：杨丽华

封面设计：董学军

一 苇 集

YI WEI JI

杭 之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85,000字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定价5.10元

ISBN 7-108-00343-0/C·22

序论：依赖的现代化 发展的反省

有人说，台湾三十年来的发展就是一部极出色的“从传统到现代”的现代化发展史，成功地使台湾从传统的社会走上一个相当现代的社会，开始迈入“已开发”国家之林。

但另一方面，台湾三十年来的发展也开始暴露出许许多多随之而来的问题，诸如生态环境的破坏、社会结构的变迁与重组所衍生的各种问题、价值秩序的混乱与解体……

我们要怎样理解台湾三十年来现代化发展的本质与性格呢？

—

“现代化”(modernization) 是一个充满歧义但却普遍通用的名词，被广泛地使用于各方面。不同的人、不同的学科在使用这一名词时有不同的意指，有的人把现代化看成工业化，有的人把现代化看成都市化，有的人把现代化看成政治民主化，有的人把现代化看成经济的高度发展，有的人把现代化看成西化，有的人把现代化看成进步……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上述的各种说法，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纷然并陈之看法的底层都隐含有一个共同的意指，即现代化

是一种向着某种“现代的标准”迈进的变迁过程，而这种“现代的标准”大致上是以近代西欧及北美之社会为蓝图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关联着当时东西对垒之世界政治局势，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纷纷独立，及美国围堵共产党势力的外交政策，美国一些社会科学家在美国政府的积极鼓励下，在社会学之结构功能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叫“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ies)的社会变迁理论或国家发展理论，认为低度发展国家(主要是指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要发展成高度发展国家必须采纳根植于西方科技经济复合体底层之行动模式，因为这些新的行动模式会使这些国家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从而使国家踏上发展之途。这个理论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随着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霸权的扩张，而成为鼎盛一时的显学，同时也对许多非西方社会的政府官员与知识精英产生很大的影响，提供他们许多朗朗上口的新名词和充满远景的新希望，并实际影响了非西方社会发展政策的制定。

究其极而言，现代化理论建筑在“传统/现代”两分的预设上，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演化的连续体，而在某些点作了质的跳跃，这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分野。现代化理论认为这发展轨迹有其普遍性，因此，各种不同类型的传统社会或前近代(pre-modern)社会都朝向现代社会演变，研究社会变迁极有名的社会学家埃森斯达(S. N. Eisenstadt)就说：“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朝向某一类型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制度的演变过程。这一类型的制度是从十七至十九世纪在西欧和北美形成，而后传入其他欧洲国家，并在十九、二十世纪传入南美洲、亚洲和非洲。”西欧社会是从中古封建社会，经过一连串漫长而痛苦的、自

发的理性化过程，在价值、制度、行为模式等方面经过质的跳跃而形成某种类型的生产方式及文化价值，并因而在历史过程中转塑成某一类型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制度。这种种社会、经济、政治、技术、文化上的特征构成所谓的现代性（modernity）。具备了现代性的社会就是现代社会，反之则是传统社会或前近代社会。

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社会之价值、制度、行为模式等都是传统社会低度发展的表现和原因，而且是传统社会快速地迈向现代社会这一现代化之路的主要障碍。传统社会要发展成具现代性的现代社会，就要克服传统社会之社会结构和价值规范所造成的束缚，透过外援、外资、外国教育机会、大众传播以及本国教育的改进及普及，来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以便一方面改变、推翻传统社会中的生活方式及传统人格，一方面奠定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及现代化人格，因而打开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转化之路。更露骨地说，传统社会要想转化成现代社会，就必须采借西方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制度，以逐渐趋近现代性所包容的价值取向。

换句话说，现代化理论就是以“现代”（modern pole）作为轴心的概念点、分析点，认为西方社会本身之内在动力所形成的现代性，透过大量的文化扩散，将使非西方社会出现大量具有个人现代性的现代人，并促进非西方社会之结构现代化，因而完成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现代化变迁过程。这一变迁过程的高峰就是埃森斯达所说的，“是一种新的文化观的形成”。埃森斯达这一类的理论家认为这可能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具渗透性的一面，“它表现在其对进步、改良、幸福的重视；强调能力和情感自然的表現；强调个性是一种道德的价值，同时也连带地强调个人的价

值；讲求效率。凡此均可由某些新的性格取向、特色或特征的形成而表现出来……”到了这个地步，一个现代社会就水到渠成地出现了。

为了“协助”亚非拉第三世界落后国家快速地过渡发展到现代社会，现代化理论的专家们设计了一串以西方现代社会之“现代性”为标准的“发展指标”，作为这些国家（在西方国家或国际专家们的协助下）制定发展政策的目标。这类专家们认为西方现代社会之“现代性”具有普遍性，因而是其他地区国家开发、发展所不可免的基准，没有其他模式可以作此用途。

二

六十年代末期以后，这种现代化理论开始遭到许多严厉的批判而逐渐显得破绽百出。譬如它所持的“传统/现代”两分的预设，其实是不顾事实地把非常复杂的传统与现代简化成两组对立的同质体；譬如它所持的单线演化观念意涵着社会演化过程中后面阶段优于前面阶段，譬如它认为西方模式是个具有普遍性的发展模式、现代性具有普遍的优越性，这些其实都是一种不顾历史、社会事实的虚构臆测，充满西方种族主义色彩，因而把一些未经批判的观念（如现代性）视为当然的价值；譬如它把复杂的社会结构现象化约为个人心理取向的简单总和，认为从传统人格转变为现代化人格这一个人性格之变化的总和即是社会的变迁（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也是扭曲简化了社会结构与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譬如它把高度发展的现代（欧美）社会和第三世界的低度发展社会视为可以各自独立发展之自足的社会体系，把两者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前者作为后者的模范、文

化价值的扩散者、启迪教育者，而不是把两者看成世界体系中互相联的部分，这其实是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必须扩张到全球各角落榨取利益以求体系之生存的帝国主义本质，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假面具……

尽管如此，现代化理论的许许多多观点及其衍生的种种“发展指标”至今仍然对许多非西方社会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有相当的吸引力与影响力，因而实质地影响着许多非西方社会之实际发展政策的制定。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对现代化理论本身作系统地批判与反省，而是要从另一角度对现代化理论之基底的“现代性”观念作一反省，从而显示根据这一理论而来之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作为理解、反省台湾三十年来现代化发展之本质与性格的可能线索。

三

从以上粗略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理论把近代西方社会之特征的“现代性”放在理论的核心，认为现代性一方面是结构现代化的造成力量，另一方面更是结构现代化的后果，因此，对于想要现代化的社会而言，如何透过西方价值行为模式的学习而追求“现代性”这一价值的转变，遂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大课题，例如曾以《传统社会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一书深深影响过现代化研究的现代化理论家冷纳(D. Lerner)就认为，现代化所需要的是有系统化的生活方式的转变，要达到现代化的目的，必须使传统人的“自我系统”在新的环境下作重新安排。

那么，现代化理论用来作“发展指标”之标准的“现代性”究竟是什么呢？

在现代化理论中，现代性就是“现代”的内涵，就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不同的学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层次来界定现代性。譬如有的现代化理论家认为现代社会的特征是有一种信仰，相信人可以用理性的、科学的方法来控制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譬如我国提倡现代化观念最力的金耀基教授在其《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就大体根据冷纳的说法，列出工业化、都市化、普遍参与、世俗化、高度的结构分殊性、高度的普遍成就取向六点作为“现代”的主要内涵，并认为它们不是一些不相连的社会文化现象，而是一“综协的整体”；譬如日本一些学者于一九六〇年在日本箱根举行一次有关现代化的会议，就讨论并提出下列七点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1. 城市人口高度集中，整个社会逐渐以城市为中心。
2. 高度运用非生命能量，财货普遍流通，以及服务设施普遍增加。
3. 社会分子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普遍参与。
4. 随着教育普及，个人对其环境逐渐以科学为取向。
5. 大量渗透的大众传播网。
6. 有大规模的社会制度，如政府、商业、工业，同时这些制度逐渐地组织官僚化。
7. 在单一的控制下，全体人民逐渐统一（即国家），同时此等单位不断地交互作用（国际关系）。

像这一类的基本特征还可以有不少组不同但类似的列法。这一类列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是一种现象的描述，也就是把西方近代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独特的、不同于其他社会（包

括近代以前之西方社会,以及所有其他非西方社会)之根本特征挑出来,作一个现象的描述。这些西方近代社会之特征现象可以说是西方近代社会成立以后的结果,也即一些现代化理论家所谓的“结构现代化的后果”。

那么,促使西方近代社会成立的根本因素究竟是什么?我们要怎样来看西方近代社会的特质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当然是众说纷纭。德国近代思想家韦伯(M. Weber, 1864—1920)对此一问题的见解是其中主要学说之一。现代化理论家们承袭韦伯的探讨主题,而将他那复杂曲折而精微的说法加以庸俗化、简单化,他们忽略了韦伯对许多历史的、结构的因素的探讨,以及这类历史的、结构的问题与理念(ideas)、价值之间的复杂辩证关系的说明,只强调理念在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后决定因素是动机、心理力量或一种价值的心理情结。例如,以写《成就的社会》(*The Achieving Society*)一书闻名的心理学家麦克莱兰(David C. McClelland)就认为心理学家已经从实验中鉴定出一种称为“成就需欲”的心理微菌(mental viruses)的东西,他说这是一种罕见的思维方式,一旦发生于个人心理之中,便能激发特别奋发的行动,使人们改变精神,让他们能够适应与促进现代化的社会。他们认为像“成就需欲”这一类的价值规范或心理力量导致了西方近代社会的成就,因此,想要现代化的社会就必须采借、追求西方近代社会中“成就动机”之类的价值规范作为自己社会之结构现代化的造成力量。

这类简单一孔化的解释观点,使得现代化理论不但不能掌握到西方近代社会所具之“现代性”的深一层意义,因而流于表面的、现象的理解,而且使得现代化理论家们几乎没有更广的资

源对“现代性”这一观念的深一层意义提出批判与反省，以致他们在使用这概念时往往流于西化的意识型态，而把“现代性”视为当然的、神圣而可欲的价值。事实上，在现代化理论鼎盛于一时之前，许多苦心孤诣的西方思想家就已经从西方文化本身之更深的层次对“现代性”提出批判与反省了。如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海德格(M. Heidegger)即从批判笛卡尔以降之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元论(dualism of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这一角度来批判、反省现代性；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思想家霍克海默(M.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即继承了韦伯之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和卢卡奇(G. Lukacs)之物化(reification, 卢卡奇这个观点的主要资源之一即韦伯之理性化的观念)的观点对西欧启蒙以降所形成的现代性提出批判、反省；即如现代化理论家们拾来当祖师爷的韦伯也从探究“西方理性主义(rationalism), 尤其近代西方理性主义之特有性质的认识以及其起源的说明”这一角度来探讨、批判、反省了现代性。

以下根据韦伯等人的观点，对西方近代社会现代性作一粗略的考察。

四

我们都知道，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重新塑造了西方近代文化，而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则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所表露出来之特殊的思维、心灵倾向的结果。量子物理学家海森堡(W. Heisenberg)曾指出：“从十六、七世纪以来，与科学基本概念密切联系的哲学观念的发展，成为自然科学发展的前驱，

并相互影响。”他所说的哲学观念的发展可以拿科学新时代的第一位大哲学家，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来作代表。笛卡尔第一次把伽利略以降那种特殊的思维、心灵倾向系统性地建构为哲学系统，这种特殊的思维、心灵倾向试图把“自然”看成一个类似理想图式的数学宇宙，人们可以将自然数学化，并以严格的逻辑推理来得到像数学结论那样具有客观普遍性之有关自然的知识。

笛卡尔在他的理性论哲学系统中，试图为人类寻找一个全新的坚实基础，他不愿接受上帝的启示做为人类认识的基础，也不愿不加批判地接受感官所感知的东西作为人类认识的基础，而要从怀疑方法开始，对我们的感觉告诉我们的、关于我们推理结果的意见表示怀疑，但最后有一个东西不能怀疑，那就是我（思维主体）的存在。这样，他得到那句有名的“我思，我在”（*ego cogito ergo sum*）。具有确定性之“自我意识”因而变成衡量、合法化万事万物的标准。在这里，笛卡尔建立起现代的主体主义，对人与世界之关系作了革命性的解释，奠定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哲学基础。

在这种现代的主体主义下，不管是在认识上或在伦理实践上，人自己被当作是评断所有真理、所有伦理生活、所有社会政治生活之工具与依据，外在世界（包括自然世界，及人的生活世界）只是可以被人透过数学、自然科学、劳动等来加以量度化、客体化的客观世界，人不再被视为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世界的产物（这是古代以迄近代以前之世界观），而被视为是能以自己的力量来量度世界、征服世界、转化世界的独立主体。

从这种无限高举人自己之主体性优位（*primacy of subjectivity*）的思想出发，现代人从一个（被现代人认为）充满迷咒和错误的世界中解放出来，这就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除去迷

魅”(Die Entzauberung der Welt)。此后,人与世界分开了,并成为对峙的存在,人以他自己的意象来再解释世界,并且透过科学、劳动来客观化世界,来了解世界。也就是说,人对世界(包括自然世界及人的生活世界)加以系统的、有目的的、持续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并在这种理性化过程中一步一步达到控制、支配世界的目的。

从海德格的观点来看,笛卡尔的哲学革命就这样把人驱向一个新的方向,并赋予他一个新的事业,那就是在除去了迷魅的世界中,站立在自己之主体性的基础上重新转塑现代社会之各种价值理念,重新建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因而我们可以说,整个现代性的历史就是在主体性优位的新导向下,完成塑造现代文明价值与制度结构的历史。

韦伯则从过程的角度来讨论近代西欧社会的成立。在他看来,近代西欧社会之成立的历史,也即现代性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持续不断除去世界之迷魅、持续不断理性化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主要是由两个部分所构成的,一是文化的理性化,其结果是现代之理性意识结构的出现;一是社会的理性化,其结果是现代之理性意识结构具体的表现在近代西欧社会之各种社会制度中。

在说明这二种理性化之前,我们有必要说明一下韦伯对近代“理性”概念的把握。韦伯在分析近代西方理性主义的特质时,把“理性”分成二种,一种叫“价值理性”,是指有意识地相信一定行为之无条件的价值(美学的、伦理的、宗教的或其他),不计其结果为何都要去完成它的态度,例如宗教徒之宗教实践行为,这种理性又称为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另一种叫目的理性(或者叫工具理性),是指在任何目的之追求上,把特

定之目的，以及为达到此种目的所可能采取的各种适当手段，以及其各自可能的结果都一一列入考虑、计算的态度，例如现代资本主义企业活动中所采用之理性的资本计算即是，这种理性又称为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韦伯认为，根据目的理性而行动的人是“对目的而言是理性地审察手段，对手段之伴随的结果而言是理性地审察目的，最后，并相互理性地审察各种应有的目的。”

韦伯对理性化过程的分析是围绕着他这一对近代西方“理性”概念之复杂而具辩证性的把握而展开的。

文化的理性化是指宗教之世界观的理性化，也即韦伯所说的“世界的除去迷魅”。韦伯透过他迷人但不甚清晰而有歧义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来铺展宗教世界观之理性化过程的内在理路。他认为，文化领域之理性化是解释西欧理性主义出现的关键，与其说西欧理性主义是直接来自人的理性（rationality）中产生的，不如说是有条件地从宗教世界观的理性化这一特殊过程中产生的。韦伯认为，在一种人面对充满着“意义”之世界时要关联着某种终极目的而取一个一致之态度这一“内在驱迫”（即价值理性）下，人们不断把宗教世界观及宗教伦理生活中一切带有巫术（magic）性质的知识或宗教伦理实践要素（如透过宗教冥思或带有巫术性质之圣礼仪式等救赎手段）视为迷信与罪恶而加以扬弃，因而使它们在这世界上所扮演之角色的重要性不断地降低，取而代之的是目的理性地组织现世生活这一俗世内的制欲精神，是世俗的、理性的知识或意识。此后，“世界”对人而言不再是充满迷魅、巫术性质的存在，而是一个因果之机制（causal mechanism）的存在，在其中并没有什么神秘的、不可测知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有的只是因果的、理性的律则在发生作用。因而，

原则上，我们可以透过理性的计算 (rational calculation) 来学习、来知道、来支配这“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也可以透过有规律的生活行为来达到宗教伦理实践的目的。这种不再由不可测知之神秘力量来理解、来支配世界，而由技术的、理性的方法和计算来理解、来支配世界的意识就是现代理性意识，它遍布在认知的、美感经验的、宗教伦理实践的领域，而表现在现代科学技术、艺术、宗教等各文化生活部门中。这种现代理性意识结构的出现，以及因而导致之根据目的理性而行动的生活态度，是宗教世界观理性化的主要结果，而构成近代欧洲人生活的根本特色。

社会的理性化则是指现代的理性意识结构具体的表现在现代社会的各种社会制度中，也即经济、技术、科学、教育、法律、行政等各方面的目的理性化 (purposive rationalization)。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文化理性化之后所产生之现代理性意识结构如何转化而具体地表现在社会行动之制度化这一层次上呢？韦伯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从目的理性行动之制度化入手，并选择他认为最能表现理性意识结构具体表现于其中之制度复合体，即现代资本主义企业活动及现代政治、法律制度，作为他主要的分析对象。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简单地说，社会的理性化主要就是现代资本主义企业活动与现代政治、法律制度之目的理性化。韦伯在这里分析了基督新教伦理在现代资本主义企业活动的成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像基督新教伦理这样的信念伦理 (ethic of conviction) 怎样系统化、组织化俗世生活的所有领域，并在人格系统中以价值理性的方式支撑目的理性行动 (如目的理性之经济活动) 的取向，简单地说，他分析了基督新教伦理如何促成了以职务观念为基础之理性的生活态度；接着他再分

析！目的理性取向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及以之为中心的现代理性法律制度如何制度化了目的理性之经济活动，而使目的理性经济活动这一个次系统从其伦理动机基础上分离出来，并奠基在目的理性计算之机械基础上，因而变成自律或自我安定的行动领域，这种理性化的结果，“助长了近代经济组织之庞大秩序的建立，这秩序与机械生产之技术及经济条件相结合，如今以压倒的强制力量决定一切生活在这机制中之个人的生活方式……”

这种将现代理性意识结构具体地表现在目的理性之社会行动中，使目的理性行动从其伦理道德的、实践的基础上分离出来，并奠基在目的理性计算之机械论基础上，使人们得以技术的、理性的方法来支配、控制外在世界（包括自然世界和社会生活世界）之目的理性化过程，使近代社会生活世俗化，使物质技术机械化、工业化，使大规模的社会制度（如行政、军事、商业、工业）逐渐组织官僚化。这些都是社会理性化的主要结果，也是其主要意义。

从以上极粗略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无论是根据海德格从现代性之本质这一层次所作的诠释，还是根据韦伯从现代性成立之过程这一层次所作的诠释，我们都可以了解，近代西方社会成立的一个关键是十六世纪以降一个新的世界观之成立，即认为世界（包括自然世界与社会生活世界）是一个以作为主体之人为中心，可以被人量度、控制的因果机制。这种“世界之支配”（world mastery）便是近代西方社会之现代意识结构的中心。这种现代意识结构不但透过文化理性化的过程普遍表现在科学、技术、宗教、哲学、艺术等各文化层面，更透过社会理性化的过程普遍表现在政治、社会、经济、法权等各社会生活层面。

在这种现代意识结构下，人类把非生命能量(或工具能量)有系统的、有目的的、持续的应用到人们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理性控制与支配，以达到人类的目的。这在经济与技术领域表现得最明显，例如机械力的大量运用、以市场交易为目的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自由财产权的强调、效率的讲求等等。

如果我们去检查现代化理论家所提出之“现代性”的内涵，便可以发现它们都可以涵摄在“世界之支配”与“理性化”之概念架构中。现代化理论家把这一些“现代性”视为当然的、可欲的价值，认为想要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应该尽各种可能努力去追求。而一些非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也这么想，例如前述金耀基教授在其《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就以充满感情的笔调写道：“在古老的社会的人们心坎里，已激起一种‘满怀希望的革命’，这一种心理上的革命使人们对‘现代’产生一种崇拜与羡慕，它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基本的文化取向及价值系统……”

然而，像海德格、韦伯之类对西方近代文化与社会有深邃洞透与反省的思想家并不是这样看，他们对现代性与近代社会的未来决不是乐观的。

五

如上所述，韦伯那种认为具体表现现代意识结构之现代制度来自宗教世界观之理性化的观点，使他有别于奉他为祖师爷之结构功能论的现代化理论家。换言之，由于韦伯这远为繁复、辩证的观点，使他极有丰富的资源对近代西方社会的未来有所批判与反省，这使他对近代西方社会的态度并不是像现代化